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七六期 ——  
(二〇〇四年四月十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404c)

---

【追根溯源】关于文革反思和毛泽东的动机	京 人
【影视评论】令人无法承受的道德倾斜	还学文
【往事追忆】我记忆中的文革	广玉兰
【亡灵祭坛】张怀怡同学自杀前后	周启博
【春秋史笔】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 ——《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序言	李 锐
【历史疑云】1973：李震之死始末	余汝信
【人物追踪】研究谢富治	温 相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xwz@cnd.org](mailto:hxw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追根溯源】

### 关于文革反思和毛泽东的动机

• 京 人 •

关于不能把文革的罪行归在一个人头上的说法非常盛行。但我怎么觉得这种议论起码在实际效果上是为前门毛们开脱。

我觉得把文革的责任归在整个民族身上起码对受害者是不公平的。比如在湖南道县被杀害的人，他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也要为自己的死承担一部分责任么？这种责任均摊实际上是没有负任何责任。

让整个国家为文革承担责任的理论接下来是要全国“反思”。但这种反思实际上没有可操作性。你是让民工、下岗工人和农民反思，还是让在文革中被当成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去反思，还是让政府官员和资本家去反思？所谓全民族反思不过是一个永远不会开始的过程，只能使历史

上的一场大悲剧成为无头债。

记得在文革初期，打人最厉害的一个是西城区纠察队，成员都是高干子弟。另一个是海淀的八一学校，成员也都是高干子弟。后来办的展览显示，他们都打死很多人。我就亲眼看见八一中学的红卫兵打死我们街上的一个老地主，他们的手段之残暴，折磨人的花样之翻新，其动机只有用 sadism，即虐待狂才能够解释。任何真的稍微有点理想的人都不会如此暴虐（所以这些人如今关于自己当初怎样乌托邦的言论总是令人作呕）。这些人会反思、会忏悔么？他们大概没有时间，因为他们现在不是政府方面大员，就是红色资本家。

不过中国人是需要反思的，反思自己为什么总是对罪魁祸首太客气，总是冤无头，债无主。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可能不那么雅，与诗人气质或理想无关。党内大清洗、波及全社会的大规模政治迫害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点。斯大林搞大清洗的时候，好多人是喊着“斯大林万岁”被枪毙。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北韩、柬埔寨……都发生过类似的大规模清洗。这些政治运动与文化革命相比，不过是规模和方式上的不同（有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对共产党自己组织的冲击、对全社会的破坏性影响、对国家传统价值观的否定都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要找动机，不如到具有共同社会体制的国家的共性中去找。

那么，斯大林、霍查、波尔布特、金日成、前门毛这些人为什么在已经坐定铁打江山的时候，还要去迫害那些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呢？到底是因为他们有更加崇高的目的，比如说浪漫精神、理想主义、不断革命理论，还是因为他们不过是在一个极权制度中患了最高统治者的通病，这就是 paranoid，多疑偏执，干了亏心事，总怕鬼叫门？记得朱元璋曾发动过两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一次打倒胡惟庸，一次打倒蓝玉，两个人都是他的老战友。朱元璋打倒胡党杀了好几万，打倒蓝党又杀了好几万，杀的绝大部分是些对他忠心耿耿的部下。朱元璋这么干到底是因为他的“诗人气质”，还是因为他是个 Jerk？

我早就打算去看 Morning Sun，但正好那个周末有点事情，只好痛失交臂。等以后出了 DVD 再去买。

没有看过电影，当然没有发言权。我只想对朱学勤的文章提起的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动机说两句。

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动机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的评论都是在借毛泽东的酒浇自己的块垒。

但他的动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做出来的事和文化革命的后果。

我曾经和一个在七十年代到柬埔寨援助过红色高棉的中国外交部老人儿聊天。他说波尔布特和乔森潘都是非常朴素、非常朴实的“好人”。

他们俩的朴实没准是装出来的，也没准是真的，不过这个问题在历史的天平上无足轻重。他们俩的为人不重要、他们俩的动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柬埔寨人造成的后果。

大家什么时候见过犹太人客观评价过希特勒的动机或为人。

前门毛也是这样。他发动文革的动机无论是什么，仅仅他拿十几岁的小孩子打头阵的做法

就是非常卑鄙的。我作为两个 teenager 的父亲，更能理解他这种做法的不道德。前门毛当时已经年过 70，他难道不知道小孩儿的天真幼稚、在没有约束时的破坏性？

记得看关于湖南道县文革屠杀的报道，贫下中农活埋地主，一个老太太抱着孙子站在坑里，土扬下来的时候，孙子说“奶奶，土迷眼”，老太太说：“孙子，一会儿就不迷了”。

我觉得文革别的丑恶都不说，就只这一件事，就足以以为老毛发动文革的行为定性了。这个被活埋的小孩的血永远粘在他的手上。

~~~~~

## 【影视评论】

### 令人无法承受的道德倾斜

• 还学文 •

“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人韩丁的女儿卡玛拍了一部讲中国“文革”的纪录片《Morning Sun》，《初升的太阳》（该片中文片名应为“八九点钟的太阳”，语出毛泽东一段著名语录——编者注）。怎么会用这样一个名字，使人感到突兀。对于无数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文革”是他们一生中最阴暗——如果不说是最恐怖——的年代，实实在在是没有阳光、没有希望。看过电影之后，感到《初升的太阳》倒也实至名归。对宋彬彬、骆小海们而言，他们生命不曾有也不再有了“文革”中那样不可一世的时刻，如旭日喷薄而出，势不可挡。一样风景，两样心情。

在全球化的今天，制片人卡玛尤其具有国际性。她特殊的身份，使这部影片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西方人可能更容易接受她的中国“文革”文本，因为他们相信那个曾经成长于那个国度、经历了那个时代西方人，相信她了解在那个国家发生过的事情。但西方人到底是雾里看花。中国观众、尤其是经过“文革”的当事人，无论是当年的“老兵”还是“狗崽子”，看了电影都不难察觉到，卡玛对于“红卫兵”——当年那些“老红卫兵”、那些“初升的太阳”——情有独钟。

银幕前后，作者着力为宋彬彬辩白，一定要为这位当年上了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大名鼎鼎的老红卫兵平反。也许我孤陋寡闻，但是查看网上“宋彬彬”的条目，关于宋彬彬打人，重覆引述的只有电影中提到的那条消息，并没有卡玛说的复数的“那些”传言，也不见有铺天盖地愈演愈烈之势。卡玛要为宋彬彬鸣冤，理由不必外求。

她为宋彬彬大鸣不平，以至于把今天看来对宋彬彬不利的说法都归为传言。

例如在毛泽东接见后改名宋要武这回事。那边，宋彬彬自己说，改名“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而是报社记者强加给她的”。这边，卡玛这里就为她辩解，“根据我对当时共产党报纸的了解——那里充满了谎言，编造——我没有理由认为那时的报纸比宋彬彬本人的话可信度更高。”我不由得发现，这与那些在两德统一后被东德国安部秘密档案揭露出来当年为它秘密工作过的人的辩白之辞如出一辙，他们也是声称，国安部的文件全都是谎言和编造，公众要相信他们本人。说文革时共产党的报纸能违背共产党的意旨，越俎代庖，制造谎言，卡玛也是在当时的共产党中国生活过的，这个假设未免太过大胆了！

至于如何对待这些她所谓的“传言”，是也？非也？卡玛直截了当地把它归结为“相信谁”的问题。她选择相信宋彬彬和维护宋彬彬的说法。她的影片请宋彬彬站出来为自己洗刷，选择对宋彬彬有利的一面之词为她辩白。卡玛谓之曰：“澄清史实”。

于是，“证史”的问题，在卡玛那里就如此轻易地脱开了严肃的事实追究。以影片中援引为证的《点滴思忆话宋岩》为例。胡平考察出，这篇文字表明，文章作者和宋岩没有过直接接触，不知忆从何来；而且收录该文的文集《草原启示录》中偏缺作者“朝鲁陶斯”的出处。作者身份尚且不明，读者和观众又如何查证作者转述的那位在偌大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一个不知名的新油田遇见的无名之乡的那位名为巴图的退休务牧干部的存在和他陈述的真实性呢？这至多是以传言对“传言”而已，与“求证”是不相关的。退一步说，假定真有那么一个巴图大叔，假定他真的说过那些赞美宋岩的话，又假定他说的也是实话，内蒙插队时期已经善良而高尚的宋岩也还是不能用来证明当年的宋彬彬没有参与红卫兵的暴力行为或没有打过人。以时间上在后的推论在时间上先的，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这样的“澄清事实”几近儿戏了。

对“宋彬彬没打过人”卡玛提出的唯一能和证明沾上边的，是所谓“王友琴说宋彬彬没打过人”。采访中她说，“例如，我问过王友琴，关于宋彬彬在的师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长的事，王友琴在这个问题上调查是最深入的，我问宋彬彬参与了没有，她说没有。”如果是指王友琴对于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之死的研究，那么卡玛也应该援引王友琴的文章。如果卡玛的所谓证明另有所指，那么她就应该交代清楚她的具体提问和王友琴的具体回答，给读者以判断的可能。仅是“我问了，她说了”这样的话，是搪塞不过去的。

我们来摘引王友琴的“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部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

……通向卞仲耘死亡的路，是从1966年6月1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所谓“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毛泽东语），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级，是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一天以后，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原校领导“靠边站”。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

……7月31日，这所中学的红卫兵宣布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后，控制学校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红卫兵组织。这二者几乎相同，因为红卫兵的领导人也是“筹备组”的成员。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师大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宋彬彬等，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

……卞仲耘被打死13天以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

王友琴是这样说，宋彬彬没有参与吗？

提出她个人的中国“文革”文本，是卡玛的自由。但是把自己的“相信”认作事实，把自己的私人文本宣称历史的真实，也就过分了。好在卡玛的电影并不是唯一的“文革”文本，我们还有王友琴，还有宋永毅，还有丁抒，还有“文革”暴力的幸存者。

再读一读王友琴一篇篇关于“文革”中打人研究吧，面对受害者苦难的历史，宋彬彬的自我洗刷，卡玛的激情辩白，不是显示了一种令人无法承受的道德倾斜吗？

~~~~~

## 【往事追忆】

### 我记忆中的文革

• 广玉兰 •

文革开始时，我也不是很大。也许正因为不大，那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便象刻在一张白纸上的印记，永难磨灭。

文革开始时，我刚小学毕业。只记得街上突然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面有倒着写的、歪着写的名字，打着又粗又浓的黑叉。然后又看见街上一队队戴红袖章的人，趾高气扬，脸上透着肃杀之气，大人说是去抄家的。很快，我们弄堂里也有人被抄了。后来，就几乎每天都会听说，又有某号某家被抄了。

祖父比我大整整一个花甲，早就退休了。过去当过一家大公司的厂长和高级主管。父亲是当时被称为臭老九的那种。父亲对自己的身份一定很有自知之明。上海一刮起抄家风，就看见他和母亲晚上嘁嘁促促商量事情。又看见他拿出一些唱片之类的东西，砸碎了，晚上偷偷丢到垃圾箱里。当时这样做的肯定不止我们一家。那段时间，弄堂的垃圾箱里经常出现领带、唱片或其它奇奇怪怪的东西的残骸。父亲喜欢拍照，还自己着色，那时没有彩色照片。客堂和房间的墙上，原来挂着好多母亲的大幅风景照，一下子全都取了下来，换上“领袖”的像。连我最喜欢的他们的结婚照，也一下子不知去向了。

父亲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没过多久，有一天，父亲下班特别早，却不是独个人回家，身后跟着一队戴红袖章的人。他虽然镇定，但他紧绷着的脸和阴沉的气色，让我感到大难临头。

红卫兵在我家呆了三天三夜，换着班来。一家十口人只能待在客堂间里，上厕所也得获得他们允许。我不知道大人们是怎么睡觉的，我们小孩子困了便和衣睡在长椅上。每个人都很严肃，连一岁多的堂弟也吓得不敢哭出声来。

三层楼的房子被翻了个底朝天，每一个角落都翻遍了，墙壁也全部敲过。东西一件一件往停在门口的大卡车上搬。天井里一棵无花果树被挖起，底下掘了个几尺深的大坑，大概是怀疑下面埋了东西。那棵树是从我母亲拿来的一棵小树苗，看着它长大、结果的。有一年结了那么多的无花果，弄堂里的孩子还爬到我家围墙上偷吃。

房间里一片狼藉。沙发被撕开，充填物散落一地。镜子被撬碎，看后面的空间是否藏着什么。终于，从阁楼的一堆破烂里面，他们发现了要找的东西：一把猎刀和几颗子弹。都是鬼子投降时我叔叔从街上拣来的，那时他还是个孩子。这一下，祖父的罪名便升格成了反动资本家，

还私藏武器。父亲解放前在外国人公司做过事，这下也不知怎么就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刷在门外的大字报上，两人的名字都被打上大大的黑叉。

他们让我祖父站在高凳子上，挂上“反动资本家”的牌子，父亲站在旁边，低头认罪。还算好，这些红卫兵都是父亲单位里的，不是同事就是工友，是成年人，不象中学里的红卫兵那么好打人，狂呼了一阵口号就离开了。

红袖章走的时候，带走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一切细软，全部现金。足足装了六卡车。父亲最心疼的是他的两大箱藏书和几盒子唱片。让他欣慰的是他拍的几本相簿得以幸存。

抄家的那几天，家里前后门大开，门口整天有一大群人围着看热闹。后来红卫兵离开了，门口大字报还在，被风刮下来了，还得自己烧浆糊去重新贴好。那些日子，抄过家的人在弄堂里走路都是低首敛目，挨着墙根走，小孩子也不例外。我从小不大言语，别的孩子也不大惹我。隔壁人家的女儿，抄了家以后，弄堂里的小孩就追着她叫枪毙鬼，因为她父亲是被镇压的反革命。

祖父在抄家后第二天，就被居委会叫去扫弄堂、通阴沟。没多久，祖父突然中风，还好救过来了，没有半身不遂。但从此健康就一蹶不振，变得老态龙钟了。倒也因祸得福，免了他去扫弄堂、通阴沟。

弄堂口有个皮匠摊子。那位师傅每天早上挑着担子来，晚上回去。又是铅匠，又是皮匠。弄堂里三百多户人家，换锅底、箍桶、补搪瓷、上鞋掌，他都包了。没人知道他姓什名谁，因他一脸麻子，大家当面叫一声师傅，背后都叫他麻皮。他知道，也不恼，整天笑呵呵的，有求必应。

祖父平时待人客气，对麻皮师傅也不例外，进出都和他打招呼。我小时候很调皮，尝学我祖父跟人打招呼时点头哈腰的样子，惹我父亲大笑，我妈则骂我没规矩。祖父却从来不恼。我家被抄以后，有一次从麻皮师傅摊子前过，见左近没人，他就悄悄问我，你家“老爷”好吗？我祖父母房里，到冬天就生个小煤饼炉取暖。麻皮师傅每年都来为我们装烟囱，每次祖父都会多给他几块钱。那年祖父中风以后，也请他来装，他硬是不要那多余的钱。祖父当时没说什么，日后提起此事，总是感叹麻皮这人讲义气。

祖父和弄堂口那些酱油店、南货店的人也相熟。中风以后，我去酱油店打酱油，去南货店买东西，两位老板都跟我打听我祖父，要我问候他。我家平反以后，母亲都特地去向他们道谢。

父亲单位对他的过去内查外调，却查不出任何问题。他当时是全国发行的一份科技杂志的编辑，参加过《辞海》的编纂。曾经有好几次上面想拉他入党，民主党派也来拉过他，都被他婉拒。父亲生性淡泊，厌恶政治。他当年的同学里，做到正教授、副部长的不乏其人。这些人在文革中，有夫妻双双自杀的、有坐牢的、有关进牛棚九死一生的、有下放五七干校脱了一层皮的。只有他，抄家后就被踢到基层厂里，当了一名普通钳工。反而因祸得福，躲过后来许多磨难。厂里工人对他很尊重，把他当宝贝，搞了好多工夹具革新。此是题外话。

我们小学毕业以后虽不用上课，却得回校闹革命。本来一起上课的同学，这时也突然阶级阵线分明。红五类们趾高气扬地站在教室中央，一边是黑七类，低头靠墙站立，听他们训话。另一边是不红不黑的中间份子，被赐坐。我家被抄以后，我自然就归为黑七类了。

记得那天是班里做好事，为附近中药店糊纸袋。原来全班人完成的工作都要我们黑七类包

干，还不准坐下，得站着干。我小时候虽然木讷，脾气却很犟。站了半天腿酸了，心里不服气，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拉来一把椅子坐下。这下子象捅了马蜂窝，几个红五类冲上来，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两个人把我拎起来，把椅子抽走，让我重重摔在水门汀地上。

第二个星期，我生病没去报到。后来听说班上一位黑七类女生挨了打。这女生平时比较伶牙利齿，不知为什么事和红五类们争论了几句。班上一个留了三级、比我们足足高出一个头、三代红出身的男生，冲上去猛打她耳光不算，还解下身上皮带使劲地抽。打得她又哭又叫跪着求饶，脸肿得象个大包子。一群人还跑到她家里，又打又砸，把她那资本家的父亲也教训了一顿。当时我听了心里直发抖。要知道，一个星期以前，那男生没在学校。否则的话，那被打的就不是她，而是我了。

第二天回校，女孩的脸还肿着。从此以后，黑七类的都老老实实，哪怕被指着鼻子嘲笑、臭骂，也没有人再敢乱说乱动了。那一年，我们十二岁。

几年以后，这位男生也去插队了，听说是去了黑龙江。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我们的同龄人，打过人的、被人打过的，后来都没有逃脱那相同的命运。其实，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好多人自己前脚斗人、打人，后脚就被人斗、被人打了。施害者，往往也是受害者。好多人被斗被打，是因为邻居告密、因为同事揭发、因为朋友出卖。人们由于平日的妒忌、嫌隙、宿仇，冤冤相报，互相残杀。那个时候，多少夫妻反目，多少父子成仇，多少朋友变成陌路，又有多少人对别人的灾难非但不同情，反而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看过不少回忆文革的作品，小说、散文、回忆录都有。多数是对那个时代的控诉，鲜有当年的参与者对自身的反省与忏悔。有时想，那个打过人的男生，现在也早已为人父了吧。不知他是否会告诉他女儿有关文革的事情？是否会想起，当年也曾有个女孩子，在他的皮带下发过抖？当他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感到失落、感到命运不公的时候，是否也曾有过哪怕一丝丝的悔恨？

文革那段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但我觉得，我们对文革的回顾，不应该仅仅只是对那个始作俑者和那个制度的控诉。当年在我们小学教室里发生的那一幕，不过是那场人间浩劫的小而又小、极其微不足道的一个缩影。我并不恨那个男生，但也无法接受他当年的行为只不过是“受蒙蔽”、因为“不成熟”的说法。那是一场全国人民都参与的运动，难道“全国人民”就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吗？

我的同龄人一定都听过许多“忆苦思甜”的报告。那些“血泪斑斑的控诉”，都是为了要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为了制造“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为了激起阶级仇恨。于是，我们便在“阶级敌人”面前泯灭掉了人性、麻木掉了良知、无视他们作为人的尊严、把他们看成猪狗不如。如果我当年不是黑七类而是红五类，我会对那件事无动于衷吗？我会在旁边跟着起哄吗？我也会去参加斗人、打人吗？我还真无法坦然地说出那个“不”字。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全面地反省文革，其目的不应该只是为了对那个始作俑者和那个政权的控诉和清算。反省的目的，更应该是为了呼唤人性、为了唤起良知、为了重申人的尊严、为了提醒人们去爱重生命。如果不是这样，对文革的反思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会有这么一天吗？我不知道。

比起许许多多其他的人，我们家当时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没有吃什么皮肉之苦，也没有家破人亡。只希望当年与我们同命运，或比我们更不幸、不幸得多的人，今天都已走出了那段往

事的阴影，都已找到了自己生活和心灵的归宿。

几年前看到一本周佩红的散文，也写了她家文革的遭遇。里面有一段话，看了很感动，便记住了：即使生命已因清醒而成熟而沉重，仍需有梦，有轻盈的小鸟在梦的枝头鸣啭，有新鲜的露滴，将人生滋润。

□ 寄自美国

~~~~~

# 【亡灵祭坛】

张怀怡同学自杀前后

• 周启博 •

张怀怡生于1945年，原住广东海丰县，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衷心拥护毛，是中共预备党员，曾任所在数学力学系901班共青团支部书记。按清华大学当时体制，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如被选入学校代表队，就离开所在系和班级，到校代表队集中住宿就餐，党团组织关系也转入校代表队，只有听课考试仍随原班级。张因此从数学力学系调入举重体操队，我因此从无线电系调入篮球队。

我对清华当局在代表队的作法素有异议，就在文革初起时批评当局，所以在代表队被目为“造反派”，于1967年初被推为学校代表队“文革领导小组”5名成员之一。张怀怡的思维方式完全由1966年以前毛式政工体制塑造，当毛为剪除政敌发动文革时，张当然无法领悟是毛要抛弃自己的旧政工体制，所以对毛支持的林彪四人帮发生疑问，也对本系本年级批判政治辅导员朱玉和发生抵触，从而在本人日记和与举重体操队成员交谈中明确表示不满。1967年3月初，举重体操队中紧跟毛新路线者据此断定张的言论已构成“反革命”，在举重体操队十余人范围内开会批判，并向我所在5人小组反映。5人小组遂决定1967年3月25日下午在全代表队百余人范围内也开会批判一次。决定之后，我有几次路经张宿舍房间，看到张面色凝重地写“检查交代”，旁有举重体操队“革命派”看守，气氛压抑。我虽与张原无交往，此时也心生同情，想乘看守不在时以“领导小组”身份向张打个招呼，告他不必过于紧张，几天后批判会上作一检讨，事情也就过去，但我终因顾虑自身而却步。1967年3月25日中午，张乘看守疏忽，从校代表队男宿舍2号楼顶以体操腾空姿势跳下。看守大喊“反革命跳楼”。我从午睡中惊醒，急找平板三轮车送张去校医院急诊室，张所在数学力学系901班同学亦赶到，与我一同协助急诊医生作初步检查。初步诊断是脑部受伤，需送上级医院北医3院。救护车乘员有限，我留在校医院等待消息，直到电话报道说颅内骨折，抢救无效。

我当夜失眠，反复自问如果我以“领导小组”的有利身份安慰张一下，是否他不致自杀？我未伸援手，对他的死有几分责任？这两个问题困扰我以后几十年。毛死后我在体育报上看到文章，报道广州体院体操教练员张怀泽在文革中遭遇，也提到其弟张怀怡在清华大学被迫害致死。时间到了1999年4月，我和张所在数学力学系901班同学都回清华大学参加毕业30周年活动。我事先向该班同学提议借此机会为张召开追思会，获得响应。追思会于1999年4月23日晚在清华大学附近的体院宾馆举行，张的同班同学，前政治辅导员朱玉和先生和我发言。该班同学黄东涛，现清华大学力学系副主任，宣读了从档案中找到的：

- (1) 1978年6月21日中共清华党委关于张“平反”的决定
- (2) 1978年8月2日张父接收抚恤金150元，生活补助150元的收条
- (3) 1985年9月2号中共清华大学力学系党委核查组关于张的报告



现将以上3文件送“文革受难者”网站公布，希望能对张和其家属有些许慰藉，并警示国人毋忘极权政治下的灾祸。

□ 2001年11月28日，原载“文革受难者纪念馆”网站

~~~~~

# 【春秋史笔】

## 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序言

• 李 锐 •

廖伯康同志以自己的坎坷经历，花两年写出了《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萧李廖案件”》；通过这个地方典型案例，反映了他所经历的这段当代痛史。

“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多少人？我没有看到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只看到几个推算的数字，有说三千万的，有说四千万的（我的有关文章引用过这个数字），各有各的推算根据。如果不说全国，只说某一个地区，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那时还包括重庆），却有颇为精确的数字。即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

这个数字是伯康在回忆录中提供的。他说明了这个数字的文件根据：1957年的《户籍年报》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有关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差正好约1000万。统计数字中一条人命只不过是1，这是太高的抽象，回忆录中还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例证。如雅安地区荣经县县委书记说的：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挨着饿挖坑，是重劳动，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来人埋这些埋人的人。这是一页怎样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啊！

问题的严重还不只是饿死了这样多的人，而在于当时四川省委的个别领导人封锁饿死人的消息，继续调运粮食“支援兄弟省市”，以致到了1961年、1962年还在饿死人。“大跃进”不是四川一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正如中共中央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的，是“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指标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在这一场遍及全国的巨大灾难中，四川（还有河南等省）是全国最突出的重灾区。其所以如此，就不能不谈到当时四川省委和中央西南局的那个主要负责同志（指李井泉——编者）了。1958年、1959年那两年参加中央的会议，我是有亲身感受的。“抬轿子”抬得最起劲的，是长江上中下游三个人（应是指四川李井泉、湖北王任重、上海柯庆施——编者），尤其是上游的这位，跟得最紧，对推行极左政策措施特别起劲，特别卖力，对于农业的破坏也就特别严重，实际造成农业的减产。在农业大放“高产卫星”，虚报产量的时候，他也不怕把牛皮吹得大。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田家英在四川农村作了调查，就同我谈过他在乡下挨饿的情况。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就批评他，不同意他的调查。后来更是硬充好汉，根据虚报的增产数从四川调出粮食，使广大农民失去赖以维持生命的口粮。这就是当时四川饿死上千万人的直接原因。出了这样大的可怕问题之后，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对策仍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的表现。一些人对此忧心如焚，为了使事态不再恶化，为了把众多的饥民从死亡上救出来，他们想方设法向毛主席写信，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要知道，当年大刮浮夸风、大报粮食高产卫星等虚假现象，在庐山会议之前，中央早有察觉。因此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其中提出了一个“讲

真话问题”，说“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为了鼓励讲真话，毛主席还这样说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问题出在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终于导致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1962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正视现实，发扬了一下民主，刘少奇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让各地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而且还强调要实行“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回到四川，仍然不肯面对现实、仍然捂盖子，对存在的严重情况仍然轻描淡写，仍然强调“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的三个领导干部萧泽宽（市委组织部部长）、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于1960年上半年，分别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中央反映了四川饿死人等真实情况，以及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霸道作风。他们为使灾情不再扩大，挽回一些损失，真可说是忠心耿耿，为民为党为国而进言。可是，这就触怒了四川省那位大权在握的主要负责同志，随后借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之机，秋后算账。这次全会是毛泽东继续向“左”倾道路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文革”提供了理论武器和前期运动准备），于是他们三人就被打成了“萧李廖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之初公开批判时，又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他们经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这方面有些具体记述，将是研究“文革”史的资料。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象，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这段史实可印证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领袖同情彭德怀的记载，参看本刊zk0312b所载宋永毅：“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一文——编者）

回忆录中对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着墨甚多，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当时专制体制的可怕，及其惯性运转的力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9年庐山会议时，同田家英、周小舟闲谈，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周小舟还曾当面向毛主席说过这一感觉。他们三人落难，既有全国背景，更具有四川特色：好端端一个天府之国被搞成饥饿之乡。50年代到70年代，在长时间“左”倾高压路线下，从党内到党外，从中央到基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平民，都有人不同程度地不断地抗争、抵制、谏议，虽然绝大多数被扼杀，遭迫害，付出了沉重代价，却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时期的到来打下了群众基础。

历史总是在种种光明与黑暗、正确与错误中曲折前进。对历史尤其痛史不能回避，也不应淡化。因为，只有深刻了解了过去所犯的错误的，走的误区和弯路，我们才能加深对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自觉性；同时，对当前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从历史镜子里见其影子，从而提高识别力，注意防范，推动改革。历史的教训被正确认识，就会成为精神财富。我们对过去的痛史，决不可掩掩盖盖，怕痛怕丑，忌讳多端；应该留给世人和后代以真实的信息，让大家都聪明一点、坚强一点。如果当代人淡忘了刚刚过去的这段痛史，后来人不知道这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不论东方西方，近代现代，重温历史，对比今昔，成败关键之一在于是否有一个民主的制

度，有一套科学决策的机制，有独立的法治体系，以保证国家、社会正常生活的运行，以保证执政党正确路线的执行、运转和发展。否则，很多事情会被扭曲。如我们经历过的人治代替法治，专制压倒民主，主义信仰变成神学宗教，党的崇高威望成为个人迷信工具，铁的纪律成为整人的手段，最杰出人物做出最荒唐事情，这难道不是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吗？难道还不应当彻底转变过来吗？

为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认为，关键之一在言论自由。这本是宪法实施、政策规定中的应有之义，但又成了建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历来有张无弛，有严无宽，乃至以言定罪。过份强调舆论一律，自然唯我独尊。一花独放，导致百花摧残，毒草肆虐。不实行遵守宪法的言论自由，不解放思想，就谈不上先进文化。言兴邦昌，言灭国亡，这是古人知道的真理。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谈言论自由。马克思主义也只能在实践中，在自由评价和自由研究中，得到检验，得到比较，其错误者纠正，其正确者发展。

伯康在耄耋之年，怀忧国忧民忧党之心，回首往事，着眼未来，叙述出一个重要地区、一个重要时期的真实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探求历史规律，以告世人和来者。我拉杂地写下一些读后感，相信读者会感谢他写了这样一本回忆录的。

( 2 / 2 7 / 2 0 0 4 )

□ 原载《新世纪》网站

~~~~~

## 【历史疑云】

### 1 9 7 3：李震之死始末

• 余汝信 •

#### 一、发生在公安部大院的疑案

1 9 7 3 年 1 0 月 2 2 日，星期一。

位于北京东长安街南侧、离天安门广场仅咫尺之遥的公安部机关大院，气氛异常。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部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外称部长）李震，被发现死于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沟内，死亡时间初步判定为 2 1 日夜间，死亡原因不明。

由于李震的身份十分敏感，得此噩耗，周恩来至为震惊，当即告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政治局委员李先念等，并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破案问题。随后的五天时间里，周恩来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案情，并听取有关部门侦查情况汇报。会议研究决定：李案破案工作，委托政治局委员华国锋负责，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协助，重大问题报政治局解决；同时，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2 3 日和 2 7 日，周恩来两次致信毛泽东，汇报李案详情及政治局会议情况。（1）

虽得周恩来本人及政治局的高度重视，成立了高规格的专门班子，但在周有生之年，一直未能查清李震的真正死因。到 1 9 7 7 年 3 月即周恩来去世年许之后，在未有任何新材料、新证据的情形下，根据新任部长赵苍壁为首的公安部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共中央匆匆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在同年 1 2 月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公安部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和公安局长以及公安部全体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批准的公安部

党组的报告，向会议宣布：李震系“畏罪自杀”。〔2〕

李震是怎么一个人？他为什么要“畏罪自杀”？他真的是“畏罪自杀”吗？

## 二、沈阳军区副政委

李震是位居中共开国将帅之列的1955年首次授衔时的解放军少将。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李震的资料空缺。1992年该书发行第二版时补简历如下：李震（1914—1973）河北省藁城县人，一九三六年在北平从事学生运动。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党组织派往山西国民革命军军官教导团，任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太行军区第六纵队十八旅政治委员，纵队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重庆市总工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兵团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公安部副部长、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以上简历是中性的，没有涉及任何评价，惟其最重要的遗漏是：李震还是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选出的第十届中央委员。另据有关资料，李震于1949年2月至12月任二野三兵团十二军副政委（十二军是三兵团的主力，军长及政委由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任）。1949年10月，十二军进抵重庆，“担负工作队任务”，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由二野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兼任，李震任重庆市委工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张霖之，中共建国后的煤炭部部长）、重庆市工会联合会党组书记、重庆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1950年12月，12军奉命离川北上赴朝，李震重返12军任原职，1951年7月，在朝鲜前线升任12军政委。〔3〕

1954年4月，12军奉命回国，隶属华东军区建制。李震调任尚在朝鲜的志愿军三兵团政治部主任。翌年1月，三兵团从朝鲜回国接收旅大地区的苏军防务，李震随部返国。1956年10月，调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2年9月，擢任第二主任（第一主任吴保山少将），1964年8月，擢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65年5月后免兼职）。此期间，于1958年增补为军区党委常委（1958年4月—1966年12月），军区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1964年3月—1966年12月）。〔4〕据《将帅名录》简历推算，李震1936年从事学生运动时年22岁，应为大学在校生（沈阳军区的老人记忆中李是清华学生，未能查证）。军队高级干部中，具大学学历者寥寥可数，故此，以“七·七”事变前后加入中共的干部来说，李震在军队中的升迁十分顺畅，他是当年大军区党委中唯一的知识分子出身、非红军年代参加革命的常委。沈阳军区的老人回忆说，李为人聪颖灵活，但又不失原则性，政治上有水平，能团结人，在军区大院威望甚高，深得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赖传珠倚重。〔5〕

## 三、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1966年，文革潮涌，9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李震任国务院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当月14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向周恩来作《关于李震到职和党组成员分工的报告》称，公安部党组成员分工是：杨奇清任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李震任第三副部长，党组第二书记，负责常务。副部长的名次排列为杨奇清、汪金祥、李震、于桑。〔6〕

文革前夕，公安部副部长的排名顺序是：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汪东兴、刘复之、凌云、于桑。1965年11月10日，汪东兴被毛泽东指定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前任杨尚昆，不仅是中共中央委员，且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地位高于正部级，故此，汪东兴升任中办主任后，仍保留副部长的名义显然不大合适，虽然，根据现有资料，未见有汪的免职通知，我们只能依据谢富治9月14日的报告，推断汪东兴此前已不是公安部副部长。至于在谢富治报告

中未有列名的徐子荣、刘复之、凌云三人，在李震到任前已先后被宣布“边工作边审查”，到9月份，虽然亦没有正式的免职通知，据谢的报告来看也已不被视为在职的副部长，文革中被打倒、靠边站而未有正式的免职、撤职通知者，在所多有，类似情况，不足为奇。

谢富治与李震早在中共建国前后曾共事过一年左右，谢其时任二野三兵团政委，李震是三兵团辖下的十二军副政委，因此，后来有人猜测李震调公安部是否谢富治推荐？不过，猜测归猜测，未有史料证实这一猜测的确切性。

谢富治在文革前已是位高权重，1955年授上将军衔，后接替罗瑞卿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革初期，更为炙手可热（至于其人的政治品质是否如日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所指控般的不堪，笔者则存有疑问）。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谢富治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67年1月，主持拟定“公安六条”，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下发。同月，被任命为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3月，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4月，任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5月，任北京军区政委，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此外，谢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兼第一、第三办公室主任。虽然兼职甚多，谢在此时期对公安部还是抓得很紧的，李震无论在部内或公开场合，都是以谢在公安工作方面的副手、政策执行者的姿态出现，作风低调，言语不多，且未见其有何出位的言论和表现。

1966年下半年后，公安部原部一级的领导除谢、李外几乎全部被停职，相当一部份局处级干部亦相继被批斗、停职审查。为使公安部的正常工作不致停顿，唯有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填补空缺。12月3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报告，调陆军第二十一军政委施义之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兼参加党组，周恩来同意。在此前后，又调军队干部四十一人充实公安部。（7）

1967年一月风暴后，对于公安系统是否能夺权，中央领导层曾持肯定态度，但很快就发现问题接踵而来，难以收拾。如在北京，先是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后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提出不能由单一组织接管，引发争议，双方大打出手，各不相让。为不让对方占便宜，又各自向中央文革提出，干脆让军队接管算了。经谢富治请示周恩来，决定军管，于2月11日由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联合发出布告，称“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牟立善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传新、王更印两同志为副主任，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8）以后，各地公安机关相继实行军管。

#### 四、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

公安部机关在军队干部调入成为主导力量后，本身并无实行军管。1968年2月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谢富治、汪东兴、李震、于桑、曾威、施义之、赵登程。其中，汪东兴是以新的身份进入领导小组，李震、曾威、施义之、赵登程均为1966年至1967年间调入的军队干部。（9）

1968年4月1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报送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主要内容：一是对公安部进行彻底改组，新的机构已组成，总数126人（以军队41名干部为骨干），其余全部人员由解放军干部带领，已于2月7日离开机关到西郊政法干校集中学习，揭发批判；二是深入开展大批判，截至目前止，共挖出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重点分子101人，逮捕22人，群众看管79人，其中包括7个副部长级干部。7个副部长级干部中，徐子荣、汪金祥、凌云于1967年被逮捕，杨奇清、严佑民于196

8年3月被逮捕，刘复之、尹肇之被监督劳动；〔10〕三是指称罗瑞卿、徐子荣、汪金祥等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资敌通敌，里通外国”，“把黑手伸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继续批深批透，批倒斗臭；四是建议由军队调来的曾威（军级）等四人组成审查清理档案小组，以曾威为组长，再从军队中选拔150人，担负审查清理档案的任务。翌年1月19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报送《公安部运动情况简报》，称公安部机构组织进行了初步改革，将原来的11个厅、局合并为5个办公室（即政治、行政、侦破、治安、接待办公室），编制由1200多人减为百人左右。精简下来的1000多名干部，春节之后赴东北佳木斯农场，走“五·七指示”的道路。〔11〕对这两个报告，周恩来未表示异议，并转报毛泽东及中央批准。

## 五、主持公安部工作

1969年4月，中央召开“九大”，公安部领导小组7名成员中，谢富治、汪东兴、李震3人当选中央委员。在随即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谢、汪分别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此后，两人已甚少过问公安部的事。公安部的工作，由李震主持。到翌年的6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当月7日《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其中，公安部核心小组由于桑、刘复之、李震、张其瑞、施义之、赵登程、曾威七人组成，李震任组长，于桑、曾威任副组长，公安部革委会由27人组成，主任李震，副主任于桑、曾威、施义之、赵登程。〔12〕从名单可以窥见，以李震为组长的公安部核心小组，是符合当时“老中青、干军群”“两个“三结合”要求的，原单位老干部以于桑、刘复之为代表，军队干部以李震、施义之、赵登程、曾威为代表，群众以张其瑞（公安部原十一局一般干部）为代表。至此，我们可以得知，李震调任公安部后，经历了常务副部长（1966年9月—1968年2月）、部领导小组成员（1968年2月—1970年6月）、部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命委员会主任（1970年6月—1973年10月）三个阶段。而在担任了公安部主要负责人的第三阶段，李震在解放干部、重建队伍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

1970年12月至1971年2月，主持召开文革后公安系统首次全国性会议——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13〕

1971年3月19日，经周恩来同意并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由公安部发出《关于加强秘密侦察力量和使用技术侦察手段的通知》，提出恢复文革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的侦察队伍和侦察工作，并强调秘密侦察力量和技术侦察手段只准用来对付敌人，绝对禁止用于党内和人民内部。〔14〕

1971年6月24日，根据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的精神，部核心小组报周恩来《关于调整编制、机构的请示报告》称：公安部的人员编制在1968年4月干部下放时，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暂定为干部126人（包括调来的军队干部41人），经过一段实践特别是全国公安会议后，随着工作的开展就感到过去暂定的编制小了，人手紧了。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和实际工作需要，拟将行政编制调整为450人（其中干部370人，工勤人员80人），占公安部原有人数的33.2%，行政机构为一室六组，保留中央政法干校，另安排编制120人。周恩来将此报告批复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审议后原则同意，但中央政法干校暂不设。9月14日、17日，部核心小组会议决定，按国务院批准的编制执行；增设警卫组，机构改为一室七组。〔15〕

1972年7月9日，公安部向国务院作《关于公安系统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和意见的请示报告》称，全国在职的公安干警38万多人，其中新成份将近一半，文革前的41万多干警只结合使用了47%，尤其是原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级领导干部，结合到省级公安机关的不足19%，而且没有一个担任一把手。遵照毛主席在各地巡视期间同沿途负责同志的谈话

纪要，为落实公安系统的干部政策，对于应该解放而尚未解放的干部，要抓紧工作，及时解放，原则上安排在公安机关，尽量归口使用，发挥其业务专长，原来的领导骨干应份配适当的领导工作，充份发挥其作用。公安机关军管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建议撤销。各级人民法院和民政部门应同公安机关分开。李先念副总理和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原则同意。（16）

1973年1月13日，根据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重新接管秦城监狱（17）（秦城监狱原为公安部十三局直辖，1967年9月根据周恩来本人的批示由北京卫戍区接管，1969年6月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管理，1972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反映该监狱存在问题的信上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1973年1月17日，公安部向周恩来呈送关于北京市公安局与公安部恢复和建立耳目工作的情况报告称：遵照周恩来1972年11月5日关于公安机关要恢复耳目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都积极行动，年内恢复和建立了一批耳目，在对敌斗争和维护治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为适应公安工作的需要，将继续加强这一工作，1月18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并报毛泽东及中央有关领导人审阅。1月19日，公安部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发出通知，传达这一精神。（18）

1973年2月12日至5月10日，李震主持召开长达三个月的第十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初始称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主要议题是公安战线开展批林整风和加强公安工作。会上，对今后的公安工作作了讨论，主要是加强对敌斗争，贯彻毛泽东关于废除法西斯式审查方式的指示，维护治安秩序，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问题等。中央委托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领导会议工作（实际上主要由纪登奎直接领导），会议最后阶段，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到会讲了话。（19）

## 六、案情侦查经过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1973年10月。

就在两个月前即8月的中共“十大”上，李震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表明了中央对他本人的高度信任。他此刻不明原由的突然死亡，确实令人疑惑重重。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实际上表达了对部内干部相当程度的不信任。经政治局会议同意，决定从王洪文主持的第二期中央读书班中，选派学员去公安部参与工作，调查了解案情。根据粉碎“四人帮”后从参加调查的董明会处查获的一张合照及其说明，从中央读书班中选派去共十八人，地方学员和军队学员各半数，地方学员是：杨贵、祝家耀、张世忠、董明会、杨波兰（女）、唐克碧（女）、周宏宝、姚连蔚、梁锦棠；军队学员是：张英才、赵仁、李德保、王兆坤、张金华、李华、蒋顺学、张宏轩、侯志坚。（20）

杨贵、祝家耀先于其他人于11月11日到达公安部，任部核心小组成员，参与部领导工作。（21）

军队学员张宏轩，曾于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间，回忆交代了调查工作的过程：

1，大体经过。我是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到中央读书班参加学习的。十月十五日读书班传达了王洪文所谓“学习与出去工作”的问题，接着军队和地方学员混合编了若干小组，参加了四川和山西省共十五个厂矿来北京解决问题的的工作。在四川799厂的有黄炳秀（女）、岑国荣、刘安元、王洁清和我共五人，黄炳秀为组长、岑国荣、刘安元为副组长。开始在西苑大旅社，

后搬到国务院招待所。工作大约有20天左右，于十一月上、中旬，又从军队和地方学员中抽调十八人，由张英才、张世忠负责，读书班办公室有两个教员和总政一个干部副处长刘彦。一天晚上突然通知坐车到公安部一个会议室里，参加人有施义之、曾伟（22）、张其瑞、祝家耀、杨贵等人。记得是施义之说了李震问题的一些情况，说中央在亲自抓这个案子，中央认为李震是他杀，对于桑、刘夫之采取了措施，（23）就王洪文副主席派中央读书班同志来帮助我们工作表示感谢等等。曾伟讲了过去同于桑、刘夫之有矛盾、有斗争，说于桑、刘夫之看不起李震、施义之他们，说李震问题发生后，于桑等人认为是自杀的，因此在会议室里吵过架，曾伟还拍过桌子等等。其他人也都有些插话。会议结束已经很晚，吃晚餐后才回读书班。第二天或第三天上午在公安部另一个会议室，公安部各部门都来了一个负责人，会议宣布了分往各部了解情况的人员名单，姚连蔚和我被分到警卫组（原警卫局），是原来的一个孙副局长带着我们到警卫组办公室，和组里同志见了见面，作了些介绍。以后我们便在这个组里以座谈、参加他们学习和个别谈话等形式了解李震案件的有关线索。了解有廿天左右（每周去三个半天）后，在公安部会议室作过一次集体汇报。这次会议后又把我分到政工组（原政治部）去了解情况。先后在公安部工作有一个多月时间。在离开公安部时，还召开了一次全体干部大会表示欢送，会上施义之、张英才、张世忠讲了话。

2，工作组在公安部的一些活动情况和了解到的一些问题。由于工作记录本在结业时读书班已收交，就回忆起的问题有：

一、到公安部后除在会上介绍的一些情况外，张其瑞等人带着大家看了有关李震活动过的地方和发现尸体处的现场：在锅炉房看了地下暖气管道，从小东门内暖气道口进去向西约30多公尺处看了是发现尸体的现场；看了办公楼环境和李震办公室，办公室窗帘绳被剪断。据介绍说，经过技术鉴定，剪绳的剪刀就是李震秘书剪信封常用的那把剪刀。看了现场等情况后，一次在会议室里，有读书班的同志，有公安部的领导人，在讲到李震的工作活动情况时，我记得是曾伟讲过，他们分工是施义之管政治工作，李震是管业务工作和总理及中央直接交办的事。张其瑞说那天晚上有人打电话到李震家里（是谁打的电话查不出来）要李震到会议室开会，李震要手灯未找到就出门走了，是他的女儿找到手灯后追出来交给了李震，李到会议室去了，深夜没有回家，由于往常也有类似情况，家属也没有问过，以后是因为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李震讲话，到处找没有找到，才发现失踪了。

二、到公安部不久，曾开过一个全体干部大会，除了表示欢迎读书班的人员外，主要是揭发批判于桑、刘夫之等领导人。有六、七人发言，主要是揭发批判所谓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说他们在一次公安会议上公开印发和批判经毛主席圈阅的“砸烂公检法”的文件；说刘夫之曾拿着被抄家时拿走过的衣服、帽子，看见被别人用旧了，就公开大骂等。

三、姚连蔚和我到警卫组后，开始是参加他们一起学习和座谈了解些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看座谈了解不出什么问题，就用个别谈话的方法。警卫组的同志对李震是自杀还是他杀有不同认识，但是公安部已经公开讲过，李震不是自杀，所以原来说过是自杀的同志思想有顾虑不敢多说话。另外有一些同志反映了于桑和刘夫之的一些情况，说刘夫之是海外华侨资本家，与侨民来往密切，关系复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被审查过，从农场劳动回来后，对住房子等问题不满意、发牢骚。说于桑家是地主，是从西南公安局调来的，来时还带来了一个侦察干部，说这个人很会吹捧奉承人，是于桑的红人。说于桑管警卫工作也管侦察工作，很骄傲。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侦察处用车子搞追踪时，有一次跟踪过叶副主席的车子，被叶副主席发现后，他们看叶副主席的车子停下来了，他们就跑掉了。也讲到警卫组的孙副局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时，从农场回来后，思想上也还有些情绪，讲李震是自杀，他讲的最早等。

在警卫组先后廿天左右后，办公室刘彦他们，通知要向中央领导汇报一次情况，本来是由



大组领导人汇报，可是在坐车回读书班途中，张英才就要各小组自己汇报。我和姚连蔚互相推脱都不愿汇报，最后他答应了他汇报，但要我帮助他搞汇报提纲。研究了三部份情况：一是警卫组人数和大体思想情绪；二是怎样开展工作的情况；三是了解到的一些问题。我按照这几个部份把情况归纳了一下，交给了他，他作了些修改和充实。在实际汇报时，他又把警卫组和劳改组共同研究的，下一步学习和批判的打算作为一个内容。

那天汇报没有中央领导人参加，只有公安部的领导人和田维新还有读书班去的全体人员。姚连蔚在汇报讲到个别谈话时，田维新说：用个别谈话的方法好。各组汇报后，我记得是杨贵讲了讲，下步如何深入的问题。

四、这次汇报会议后，学习班的人员有些调整，给我分配到政工组（原政治部）去了。政工组里有一个重点怀疑对象，分了三、四个人做他的工作。是政工组的一个军代表负责，还有几个地方同志。据他们介绍怀疑这个副处长：说他有这方面的思想基础，说他和于桑等人来往密切；说他在事情发生后，有反常表现，也传播过“自杀风”；就在李震发生问题的时间里，他自己讲的活动时间和地点和别人反映的情况不一致等等。我也参加这个小组的一些工作，一起分析研究一些情况，一起进行思想帮助，也批评过他的态度是说：你可不要认为你搞过侦察工作，用侦察那一套来对待同志们。可是从我到这个组，直到离开始终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3，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态度。（略）（24）

## 七、经不起推敲的“结论”

派至公安部的中央读书班学员，对侦查破案都是门外汉，从张宏轩的交代材料来看，他们的所谓调查没有什么成效。

今天，我们没有证据也没有意图去推翻自杀说，我们认为有问题的，是“畏罪自杀”这一结论中的“畏罪”两字。

据官方的“中国警察网”的说法，李震是“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有几件涉及到他的罪行受到追查而畏罪自杀。”（25）

由官方编写的《公安史稿》则有如下说法：“据事后查证，李震确有自杀取死之因。他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林彪党羽刘丰曾秘密串联，进行反党活动。刘丰被捕审查后，他又篡改了刘丰的供词，掩盖自己的罪行。在这之前，他还参与陈伯达、吴法宪制造‘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冤案，诬陷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1973年9月，他去山东省查破一个与该案相似的案件，知道中共中央对冤案制造者处理很严，因而畏罪思想压力很大，同年10月，中共中央追查陈伯达交代的一份材料，他因为这份材料被压在自己的手里感到很害怕。由于罪孽深重，他畏罪自杀不足为奇。”（26）

所谓“林彪集团”成员，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前已清理完毕。被指称与该集团有关联的人员，根本不可能出席这次代表大会，更不用说当选为该届中央委员。李震顺利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本身就证明了他与“林彪集团”毫无牵连。

李震是二野出身的干部，与所谓“林彪集团”成员没有历史渊源。建国后在三兵团及沈阳军区时期，与林彪陈伯达等人亦没有任何直接的工作关系。到公安部后，一直遵循多年养成的传统作风和组织原则，主持公安部工作后，每有大事，均经上下级关系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周恩来本人，与“林彪集团”及“江青集团”均不往来，何从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

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至于“公安史稿”所提及“罪孽深重”的“取死之因”的几件事，语焉不详，似是而非，是否确有其事，暂且不论，即便确有其事，大都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可以原谅的“错误”或仅能算为工作上的失误。试问即使是压下了一份文件在文件堆里，没及时转出，算得上是“罪孽深重”吗？如果真是重要的文件，都有严格的收发制度，这部份文件，秘书都会及时处理，不可能积压。

如果真有文件压下来，决不会是什么重要材料，况且，李震与陈伯达素不相识，压下他的交代材料干什么？

从李震主持公安部工作后对待解放干部、重建公安队伍的积极、开放态度来看，他不仅无过且有功。仅从上文提及1971年6月部核心小组报周恩来的报告提出重新设立中央政法干校而不获批准的事例来看，李震重建公安队伍的积极态度不是比周恩来更可取吗？

对于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们往往只机械地分成两类——不是“受迫害致死”，就是“畏罪自杀”，非红即黑。自然界是多姿多彩的，人类亦然，难道除红、黑两色外，就没有白色？灰色？譬如说，因工作压力沉重引致抑郁症而自杀？

以笔者之愚见，李震人生悲剧的源由，在于被历史推上了一个不适合于他本人的舞台。

文革中，沈阳军区陆军第23军政委张午，奉派至中央广播事业局任军管小组组长。到任后，一看局面并非自己所能驾驭，当即声称阑尾炎发作，要回部队治疗，从此再不涉足“三支两军”工作。张午日后提为沈阳军区副政委。

李震的本性，还是知识分子气重，说听话纪律性强也好，说有一点懦弱亦可，反正是没有张午般滑头，要说他人生的最大失策，就是没有及时抽身而退，离开公安部这一是非之地，回到他所熟悉的军队。

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点了李震、施义之、曾威、赵登程等四位文革期间奉派到公安部的军级以上干部的名，除李震自杀外，其他三人命途各异。

赵登程，在李案发生前的1972年10月已被关押审查，十一年后“两案”审判期间的1983年11月2日，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27）

施义之，李案发生后，公安部核心小组由其牵头负责。1977年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异地安置。21军的老人对施的评价是：勤勤恳恳，老老实实。据说，施在晚年最大的感慨是：搞了一辈子的政治，到底还是不知道什么是政治。（28）

曾威，1975年5月，调回军队任天津警备区政委，1983年9月离休（副兵团职），进京安置。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就是及时离开公安部回到军队系统的好处。（29）

（2003年11月）

注释：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629。
- (2) 据公安部《人民公安报》主办：中国警察网（www.cpd.com.cn），公安大事记。
- (3)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二军军史》（陆军第十二军，1981）；《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组织史资料（1949—1987）》（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 (4) 据沈阳军区政治部研究室编印：《沈阳军区大事记（1945—1985）》等。
- (5) 访问王淮湘、张纪之记录（2003年3月18日）。
- (6)、(7) 同注（2）。
- (8) 据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布告（1967年2月11日）。牟立善，陆军第38军副军长；刘传新，陆军第27军副政委；王更印，陆军第55军215师政委。
- (9) 同注（2）。曾威，1955年授少将衔，时任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赵登程，空军第8军副军长。
- (10) 严佑民，原公安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1965年7月已调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政法机关党委书记，报告中提及严，可能因严组织关系尚在公安部；尹肇之，公安部党组成员。
- (11) 同注（2）。
- (12) 据中发〔70〕44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对国务院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报告的批示”（1970年6月22日）附件一、二。
- (13)、(14)、(15)、(16)、(17)、(18)、(19) 同注（2）。
- (20) 十八人中，有十人（地方学员的全部及军队学员一人）是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分别是：杨贵，原河南林县县委书记，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委；祝家耀，原上海5703厂工人，中共第十届中委；张世忠，北京市总工会副主任，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委；董明会，原武钢耐火厂工人，中共第九、十届中委；杨波兰，原青岛国棉六厂工人，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委；唐克碧，原四川女子石油钻井队指导员，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委；周宏宝，原上海钢铁厂车工，中共第十届中委；姚连蔚，原西安昆仑机械厂工人，中共第九、十届候补中委；梁锦棠，原广州电机厂工人，中共第十届中委；张英才，战斗英雄，陆军第13军副军长，中共第九、十届候补中委。
- (21) 同注（2）。
- (22) 应为曾威，以下交代材料“曾伟”同。
- (23) 应为刘复之，以下交待材料“刘夫之”同。所谓“采取了措施”，应是指经中央批准，对于桑、刘复之实行“监护审查”。
- (24) 张宏轩：“关于参加公安部了解所谓李震被杀问题的揭发交代”（1977年11月26日，上交材料）。张宏轩，原解放军政治学院师职干部。
- (25) 同注（2）。
- (26) 中国人民公安史稿编写小组：《中国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页343、344。
- (27) 《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页94—115。
- (28) 访问费龙山记录（2002年9月12日）。
- (29) 北京军区联勤部北京第四干休所编：《岁月如歌》（2003年），曾威简历。
- ~~~~~

## 【人物追踪】

研究谢富治

• 温 相 •

谢富治一直是党史和军史上的谜一样的人物之一，因为死的比较早（死于1972年3月——编者），所以，有些活动还是没有展开，但是，由于他扮演的角色的重要和在文革中的高超技艺，使得我们越来越愿意把目光投到这位军功泛泛但是却异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兼毛泽东晚年的少有的宠臣身上来了。

#### （1）谢富治和张国焘。

谢富治和吴德峰、黄志勇、戴季英等人都是一路从红军时代肃反过来的，都是有名的整人专家，但是，谢富治和这些人又有所不同，吴德峰虽然整人狠毒，但是，后来解放后大义灭亲，因为执法杀了自己亲弟弟；戴季英是一门忠烈，而且，解放以后他已经多次检讨有关错误，没有再犯类似的错误；黄志勇只是一个疯狗似的人物，形不成威慑力。唯独谢富治不仅胸有城府，而且，胆大心细，心狠手辣，不讲情面，即使是康生这样的老谋深算的人对谢富治也是畏惧三分。然而，最早发现谢的才能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张国焘。

谢富治在四方面军的位置后来十分显赫，做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前一个组织部长是和张国焘的亲信之一的黄超平级，后一个则是监视川陕省委书记傅钟的监军。在四方面军的多次肃反中始终没有看到谢富治的身影，那么，他的功劳来自于何处呢？

根据现存的《红四方面军肃反资料实录》和《公安部关于内调谢富治历史问题卷宗》以及《确认谢富治在文革中所犯罪行通报》等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谢富治在红四方面军时期负责的主要是清洗军队和分局内部不得力的干部和提供清洗的证据和名单。在这方面，《红四方面军肃反资料实录》中指出：“谢富治在张国焘的指使下，分别就许继慎、曾中生、王树声、徐向前、傅钟的问题做了详细的汇报，并且建议张国焘对待一切敢于对抗所谓中央意图的措施采取最为严厉的手段，其中，他积极配合黄超等人收集和诬陷徐向前同志、傅钟同志、王树声同志的材料，采取无中生有等卑鄙手段对上述同志采取的不正当的处理行为，程训宣事件就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此外，谢富治伙同黄超、李特对大批师长以上的指挥员进行监视、跟踪。谢富治提出‘要勇于怀疑一切’的反动口号，得到了张国焘的赞许，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政治会议上多次夸奖谢富治是‘尖锐的锥子’。”（该书152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谢富治在四方面军所作的工作大量是组织内部的，所以，这和黄超等人的穷凶极恶又有所区别。因而，在后来清算张国焘问题时，谢本人除了卖身投靠之外，因为没有直接参与杀害许继勋等人，所以，相对没有血债。得以轻松过关，而另一方面因为毛泽东的极力保护，谢富治只不过暂时的改任了一下地方工作而已，没有受到实质性的贬斥。随后，抗日军兴，谢富治再度还阳。

至于谢富治在清算张国焘的罪行的过程的表演，下面还要详细介绍。

#### （2）谢富治和毛泽东。

谢富治之被毛泽东激赏，正是在于他得力的揭发了张国焘的罪行。虽然，四方面军揭发张国焘的大将还有李先念、许世友等人，但是，真正接近组织机密和人事核心的还只有谢富治，假如黄超、李特能有谢富治一半的聪明，后来也不至于死于新疆。

关于谢富治的功劳，在很多文献中不再被提及，并不是避讳张国焘的事情，而是因为谢富治已经遗臭万年了，没有必要为他评功摆好，一度，在教科书中，连陈谢（陈赓、谢富治——编注）兵团的字样都被取消。但是，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确实实在无法避免的提到谢富治这样异常重要的人物。在《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中十分罕见的提到这样一段话：“张国焘同志背着党中央在鄂豫皖地区实行军阀统治，受到了很多同志包括徐向前、

陈昌浩、王树声、谢富治等同志的抵制……根据谢富治同志揭露，张国焘对于中央一贯阳奉阴违……。”可见，谢富治在揭露张国焘的罪责方面确实具有足够的表现。

在延安时期，朱德、刘伯承关于揭发张国焘的组织军事路线错误的时候，竟然也再次提到了谢富治提供的材料。朱德说：“谢富治同志提供的一些证据表明，张国焘顽固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而最具有权威的则是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帮助教育挽救张国焘工作会议上发言：“一段时期以来，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影响了很多的同志，干部战士。前方后方，以致于很多人认识不到他的危害性所在，但是，谢富治同志在这方面是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的……。”无疑，这些有益的工作一定是对张国焘的致命的打击。

时隔多年以后，在延安的整风会议上，毛泽东再度提及谢富治，他说：“我们共产党员要有坦白的襟怀，有了错误不怕，要勇于改正错误，比如谢富治同志，也受过张国焘的欺骗，但是，他不仅改正了错误，还帮助党中央及时的挽救了一些还在错误中糊涂着的其它好同志。”这段话更加可以说明谢富治在整顿张国焘过程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

正是由于谢富治顽强的表现，因而再度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为他走向新的起点奠定了基础。

### （3）谢富治的“功勋卓著”。

而谢富治真正表现出他巨大的杀伤力和足够的城府以及手腕则是在于1959年之后。

庐山会议之后，罗瑞卿卸任公安部长，提名入选公安部长的人选除了杨成武、杨勇、张际春等人外，还有张宗逊。但是，毛泽东直接提笔写道：“富治同志如何？请政治局议一下告我。”这样似乎是商量的口吻其实等于告诉刘少奇等人，谢富治是合适的人选。谢富治当选之后，毛泽东还对其它常委做过解释：“公安工作很重要，但是，不能总是一方面军里面出人，要搞五湖四海，彭德怀他们搞个军事俱乐部，就不是马列主义嘛，富治是四方面军的，但是，他对党的忠诚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嘛，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嘛。”（《毛泽东思想万岁》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123页）

而谢富治上任之后，果然是不负众望，他不仅给毛泽东留下了坚定的印象，而且，保护了康生，联络了林彪，从而使他的位置日益巩固起来。

康生在上海时期有一段历史是始终说不清楚的，也就是他化名赵容被捕而后居然很快释放的事件，这件事，舒同、饶漱石分别和毛泽东谈起过，特别是饶漱石主政华东之时，专门为此作过调查，并且把材料直接送给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对此的批示却在1960年，非常奇怪，而且，还是直接批给谢富治的。谢富治衔命南下，历时一段时间后，作出新的结论，新的结论在1965年底，毛泽东把它交给了康生，康生感激莫名，通过江青传话给毛泽东：“主席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永远主席的一个老兵。”而后在接见红卫兵南下揪斗王任重代表团时，康生当着谢富治的面说了这样一番意义含蓄的话：“富治同志经验丰富，目光敏锐，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其实，他才是我们党的肃反战线的杰出代表呢。”出自党内著名肃反专家之口的评价显然非常重要。而同时让康生胆寒的是，谢富治显然掌握比他看到的材料更多的背景，以康生的为人，他不会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何在的。而谢富治代表的哪一方的势力，康生显然更清楚。

陆定一是刘少奇或者说是1959年之前毛泽东在宣传战线的代言人，当时，他一身兼任

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文化部长、副总理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数一数二的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但是，他的老婆严慰冰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惹来了麻烦。化名基督山的案件就是在谢富治手中侦破的，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关键是谢富治把这个人情做给了江青，成为江青代表游泳池和毛家湾联络的开机。从此，江青就不再把谢富治看作一般的战友，而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忠诚的战士”了。至于林彪无疑更加对谢富治的表现表示出足够的热情。九大预备会上，林彪提议谢富治进入政治局，当然，他知道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

在处理王光美专案问题上，江青名义是顾问，其实是灵魂，而直接决定把处理大权交给江青的正是谢富治本人，所以，在林彪向江青“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最高敬礼”的时候，江青说出了真话：“没有富治同志的敏锐的洞察力和侦破能力，我个人是非常渺小的。”骄横一时的江青说出这番话也不是偶然的。

#### （4）谢富治的为人

谢富治冷酷无情的一面深为毛泽东所欣赏，曾志曾经回忆毛泽东之于陶铸，她以一个跟随毛泽东多年的战友的眼光观察毛泽东之后，她说：“主席其实不喜欢陶铸，因为陶铸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话外之音不言自明。而谢富治显然是因为所谓的革命理智超越了革命感情，所以，才得以在两次较大的历史漩涡中获得“新生”。

在毛家湾最为鼎盛的时候，谢富治是林彪夫妇的座上客，吴法宪空运来的螃蟹，叶群总不忘给谢富治、刘湘屏夫妇送去，而获得了副统帅的馈赠以后，谢富治也要连忙过府道谢，一来一往，关系很是密切。然而，在毛泽东命令谢富治调查黄永胜的时候，谢富治不仅十分卖力，而且，提供了极为有力的证据。庐山会议之后，黄永胜多次和人说起一首诗，也就是那首“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而且，谈及的对象包括韩先楚、王必成、许世友等人，其中许世友、韩先楚都做了必要的解释。毛泽东对此一直牢记在心，后来南巡著名的讲话中还专门提到了黄永胜的这首诗，毛泽东说：“我就不相信，黄永胜就能指挥解放军，解放军就听他一个人的？有人说我是秦始皇，希望我快点死，死了他们好上台啊。”（《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后，在林彪死后，毛泽东故意让黄永胜在总参宣布林彪叛逃的通知，据当时的目击者回忆，黄永胜在念报告时辞不达意、三度说错，极为狼狈。毛泽东听说之后，说道，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消灭林彪集团过程中，谢富治已经身染重病，但是，他一直拖着病体坚持部署毛泽东的指示，给林彪、黄永胜以最后的一击。特别是布置了大量的公安执勤人员分布在指定地点，虽则没有起到什么具体的作用，但是，仍然被毛泽东所肯定。连周恩来都承认，谢富治同志心思缜密，能力突出。由于谢富治的病重，毛泽东不得不启用吴忠、李德生、吴德等人作为后备，但是，他们被告知，遇事可以同富治同志商量解决并告总理知道。

九一三事件之后，谢富治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其后，用江青的话说，主席赞赏富治同志的高度的阶级觉悟性。

谢富治是深深知道江青之于毛泽东的重要性，所以，一旦江青阵营出现麻烦，谢富治总是第一个露面，不遗余力的办理，比如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叛徒事件、张春桥妻子李文静叛变事件等，谢富治都是第一时间出动，紧急平息异议，就此深得江青的器重。所以，尽管谢富治独邀天宠，但是，从来没有受到来自江青阵营的冷箭。谢富治虽然不能和周恩来举足轻重的作用相提并论，但是，他却一直受到了来自毛泽东、江青不同方向的认同。

可以这样说，如果谢富治不死的话，十大之上，李德生的位置很有可能就是谢富治的。

谢富治作为毛泽东晚年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扩大于文革，但是，却形成于延安，回想起另一位杀手一类的人物康生的逐步得宠，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心机的发展取向了。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